

成中英——建設性的現代新儒家

■ Robert Cummings Neville（南樂山）

波士頓大學神學院

翻譯：李貞勝（電子科技大學格拉斯哥學院）

校對：李勇（遼寧大學哲學院）

引言

中國文化欲實現世界化，中國哲學必須走向世界，此即意味著凸顯儒家傳統的世界性面貌與普遍性價值。儒家於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並在漢代確立了自身的傳統。當然，儒家內部亦存在分歧，如孟子與荀子之間，但在與其他學派的論爭中，儒家學者大體維持了統一的立場。事實上，這些思想家不僅是立足於傳統的繼承者，更是基於傳統向前邁進的發展者。

西方學界熟悉的中國儒家代表，如董仲舒(179-104BC)、王充(27-100)、王弼(226-249)、韓愈(768-824)、李翱(772-841)、邵雍(1011-1077)、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朱熹(1130-1200)、王陽明(1472-1529)、王夫之(1619-1692)、顏元(1635-1704)、戴震(1723-1777)、康有為(1858-1927)、熊十力(1885-1968)、張東蓀(1886-1973)、馮友蘭(1895-1990)、方東美(1899-1977)、牟宗三(1909-1995)、劉述先(1934-2016)等，都是儒家傳統的發展者，成中英便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一些西方學界不熟悉的學者，也是儒家傳統的發展者。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期待著與西方相遇，這個願望在1912年變得尤為緊迫。隨著1949年的變局，大部分儒家學者離開中國大陸去台灣或

其他華人地區，也有人去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這些地區，尤其是「大中華」之外的地方，使儒家哲學面對更大範圍的全球化世界。現在，中國哲學不能再像西方哲學那樣僅僅維繫過去的傳統了，它必須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實現自我更新。

成中英1956年在台灣國立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958年在華盛頓大

學獲得哲學碩士學位，1963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從1963年起他一直在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任教。在哈佛大學，他研究皮爾士和科學邏輯，但他的研究範圍遠不限於此。在這篇文章裏，我將探討作為現代新儒家的成中英在五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一、對中國傳統及儒學的理解；二、作為當代哲學家在儒學上的貢獻；三、應用哲學解決一系列現實問題；四、作為學界領導者，創辦《中國哲學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和國際中國哲學學會(ISCP)；五、作為儒家學者的生活。當然這五個領域並沒有明確的分界，也無法涵蓋成中英事業的全部。在這裏我必須

摘要：成中英以自己的哲學語言創建了他的哲學體系，完成了其作為當代中國哲學家的使命，從這個意義上說，成中英是典型的儒家。作為現代新儒家的成中英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1、對中國傳統及儒學的理解；2、作為當代哲學家在儒學上的貢獻；3、應用哲學解決現實問題；4、作為學界領導者，創辦《中國哲學季刊》和國際中國哲學學會；5、作為儒家學者的生活。

關鍵詞：成中英；現代新儒家；中國哲學

說，從1978年起我便和成中英成了朋友，我對他的瞭解當然無法擺脫一位朋友常帶的定見。雖然如此，我覺得我還是有的一些獨特的見解。

對傳統的理解

每一位儒家學者都要瞭解自身的傳統，並用語言來加以闡發，這與邏輯學家和分析哲學家所受的教育不同，雖然分析哲學家中也就不乏對傳統感興趣的。成中英致力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在他看來，中國哲學史，特別是儒家和道家從先秦到當代的歷史演變，最能體現傳統，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為他理解儒家傳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專門研究過晚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戴震，出版了《戴震的原善研究：翻譯及介紹》一書（1971，夏威夷大學出版社），書中他對這位重要人物做出了經典性的儒學史定位。他還把戴震的《原善》譯成了英文，對現代英語讀者瞭解戴震的思想非常有意義。此外，成中英對中國哲學的諸多領域都有廣泛涉獵，包括古代經典及朱熹、王陽明的新儒學等等。

成中英對傳統的理解並不局限於中國哲學史，他同時也是西方哲學史的專家。在西方哲學領域，他不僅熟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世紀哲學及現代西方哲學，在哈佛大學他還專門研究了西方哲學史很少涉及的邏輯學。華盛頓大學碩士及哈佛大學博士階段的學習，為成中英奠定了堅實的西方哲學基礎。他的成果經常涉及西方的哲學文獻。

他在哲學史研究中用力最勤的是《易經》。《易經》是非常古老的典籍，有好幾個新發現的版本。通常情況下，大部分學者往往重視《易經》的史學價值及版本差異，而成中英卻把《易經》看作建構當代思想的重要資源。他認為《易經》對中國哲學史的整個發展過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從對中國哲學史的總體把握上，強調了自己這一判斷的確實性（true）。當然，哲學上的「真理」（truth）很難下定義。而成中英對「真理」的看法也是非常令人感興趣的。

成中英憑藉其深厚的中西方哲學素養，在當代學術爭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當代哲學界，他是知識背景最廣闊的一流學者之一。西方哲學，對

於早期的現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乃至後期的劉述先，都是一種外來的異域文化，而成中英，已把西方哲學看作當代哲學家進行哲學研究的背景資源，這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成中英的哲學

基於以上中西方哲學的探索，成中英創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1991年出版的《儒家與新儒家哲學的新向度》一書，收錄了成中英二十多年來發表的關於儒學研究的論文。在這部書裏，成中英開始建構自己的哲學，這在關於懷特海、海德格爾與儒家比較研究的論文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他稱自己的哲學為本體論的，同時也是現象學的、詮釋學的，而這些名稱都來源於西方哲學。

他的哲學是本體論的，直接面對基本的本體論問題，特別是關於存在的本質及一與多的問題。本體論與現象學的區別在於現象學不對心靈現象的真實性做判斷。本體論也與詮釋學不同，詮釋學僅是對現象的解釋，本體論則賦予解釋以基本的本體論結構。成中英傾向於懷特海的看法，強調所有事物都在不斷變化，凡是時間中的存在就意味著變化。這也是成中英在《易經》裏發現的中國精神遺產的核心，這一核心思想一直在中國傳統中延續至今。

他的哲學是現象學的，因為他主張感知在廣泛的意義上是一切知識的源泉。成中英的現象學強調異域的感知，在這一點上，他的現象學更接近於海德格爾，而不是胡塞爾。與本體論不同，現象學依賴於顯現而不是邏輯論辯。現象學與懷特海意義上的本體論不同。懷特海致力於發明一套用於邏輯論辯的詞匯，而成中英卻抉發一套表示指示（pointing）的詞匯。與詮釋學不同，現象學揭示存在和變化的真正結構。成中英的多數哲學論斷是以這樣的形式出現的——評論其他哲學家的思想，揭示他們所忽視的內容，這些哲學家大部分來自中國的傳統，但並非全部，可以說成中英的哲學的主要目標是揭示（disclose）。

成中英的哲學也是詮釋學的，認為眼見為實是一個假設。據我所知，他從不把關於事物的知識斷言為確定的，而只是一種關於真實的最好假設。

他的哲學是詮釋學的，並不是在本體論上為知識的確定性提供基礎，在這一點上，他與查爾斯·皮爾士是一致的。他的詮釋學認為對真實結構的揭示仍然只是「最好的假設」，而不是真正的簡單的看見。這意味著他的詮釋學是關於最好的看法的一種穩定的態度，卻永遠不是最終的論斷。

儘管成中英經常以回應伽達默爾和利科（兩個「詮釋學家」）的方式闡釋他的論斷，但我還是認為他受到查爾斯·皮爾士的影響更大。成中英的論斷借鑒了西方思想家的英文表達範式，但並沒有被他們的思想框架所拘囿，因為他的哲學資源主要來自中國，特別是儒家的傳統。他的哲學發端於《易經》詮釋學，並把《易經》詮釋學貫通到孔子、孟子、荀子，及周敦頤、特別是王陽明的哲學之中，並以之參與當代問題的廣泛討論。雖然已過八十五歲高齡，成中英仍能對各類問題發表洞見，並受邀參加幾乎所有領域的學術研討會！

成中英是典型的儒家學者嗎？我們應該首先在他的哲學裏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的，他的確是。他與西方哲學的韻韻中始終秉持著儒家的立場，這是我們所樂見的儒家的方式。總體而言，他認為西方哲學過於物質主義與二分化。他力圖以西方哲學的邏輯形式重建早期中國哲學，同時他所採用的方法又避免了西方哲學的物質主義和二分化弊端，他的哲學給我們燦然一新的感覺，滿足了我們對一個儒家學者的期待。

實踐應用

此外，與很多西方哲學家不同，成中英對現實問題也做了非常細緻的研究，這體現了他作為儒家的另一面。他用漢語寫過幾本管理學理論的著作，當然，這是他一般哲學思想的現實應用。他的管理哲學以《易經》為源頭，並貫穿整個儒家傳統，其當代實踐體現在《智慧之光：中國管理哲學的現代應用》（與周翰光共同主編，上海：中國紡織大學出版社1997年）一書裏。這種實用性的著述在西方哲學中很少見到，卻恰恰符合儒家傳統。因為這些著述是用漢語寫作的，英語讀者無法瞭解，使他對夏威夷的學術標準不無擔憂。

士

每一個儒者都要把自己訓練成「士」，這一理想能否實現取決於儒者的社會地位，尤其是他或她能否处理好與周圍人的關係。對成中英來說，較之夏威夷大學的繁重教學工作，創辦《中國哲學季刊》和國際中國哲學學會更能體現出一個「士」的擔當。1973年，成中英任主編、柯雄文（Antonio Cua）任副主編的《中國哲學季刊》創刊，這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學者用英語發表論文的學術期刊。擔任編委會成員的著名學者有：Dirk Bodde, Wing-Tsit Chan（陳榮捷），Chung Yuan Chang, Januz Chmielewski, H. G. Creel, Arthur Danto, Paul Demieville, Eliot Deutsch, Wm. Theodore de Bary, Thome H. Fang（方東美），A. C. Graham, Leon Hurwitz, D. C. Lau, Shu-Hsien Liu（劉述先），Tsung-Shan Mou（牟宗三），Donald Munro, Hajime Nakamura, Joseph Needham, David S. Nivison, Benjamin Schwartz, N. G. Senin, Vincent Shih, John Smith, Chun-i Tang（唐君毅），Hellmut Wilhelm, and Hsing-Shun Yang. 1973年1月的創刊號發表了方東美、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Arthur C. Danto、柯雄文、成中英和 Robert S. Cohen等人的論文。方東美教授在論文結尾處寫道：

最後，我們尊敬生命的神聖。我們站在整個宇宙精神之前，呼籲大家本於人性的至善，共同向最高的文化理想邁進。也就是為了整個原因，傳統的中國思想不受原罪的干擾，而且相信憑著我們的純潔、莊嚴的本性，可以得到精神的升華。中國人的思想在這方面是獨一無二的，絕不會如牛津大學的陶滋（Dodds）教授所說的，像西方人那樣背負著「罪戾的文化」的傳統，而感覺命運的沉重。^[1]

這個編委會和作者的名單是多麼壯觀！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闡揚更令人讚嘆！

如今這本雜誌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成中英教授仍然是主編。與創刊時不同，現在英文及多語種的同類刊物很多。但《中國哲學季刊》仍然站在同類學術刊物的前列。在一般性的選題之

外，成中英還組織編輯了很多專題性論文，使《中國哲學季刊》在廣泛的學術領域裏獲得了進一步發展。

1964年，成中英在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參加國際東西哲學家研討會時，開始籌辦國際中國哲學學會。他招集一批資深的哲學家和他一樣的青年哲學家不時開展非正式的學術討論，直到1975年6月正式成立中國哲學學會。1977年，他把學會改名為國際中國哲學學會，1978年在費爾菲爾德大學（Fairfield University）召開了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第一次大會，此後每兩年舉辦一次會議。繼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的第一次會議之後，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加利福尼亞大學聖亞哥分校、夏威夷大學希羅分校、慕尼黑大學、北京大學、波士頓大學、東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斯德哥爾摩大學、新南威爾士大學、紐約大學水牛分校、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等先後承辦過國際中國哲學會議。1983年之前，成中英一直擔任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的會長，1989之前的會議也一直由他組織，現在他仍然是創會會長和榮譽會長。他對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完美詮釋了他作為儒家「士」的精神追求。

個人生活

儒者的相當一部分生活呈現出個體性特徵。眾所皆知，「個人生活」這一概念對於歐洲人和儒者具有不同的含義。在儒家看來，從對禮儀的深入內在學習到與他人最外在的交流，所有的生活都具有「私人性」。「私人的」，同時又是可以公開討論的。對一個儒者來說，公共生活寓於個人生活之中，比如，合乎「禮」的所有公共行為都建立在個人自我實現的基礎上。在中國哲學視域中，所有的行為、言語，乃至人際關係，包括有組織的活動（如國際中國哲學學會）都具有中國人理解的「個人性」。同時它們又具有公眾性，因為它們是在世界上客觀存在並且與其他人互相作用的。而人正是通過他或她對世間事物的積極回應建立起個體的特性，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公共性的回應主要還是私人的。

成中英的生活是典型的西方哲學教授的生活。他從夏威夷大學哲學系開始了教學生涯，培養了成百上千的學生，並在很多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作為《中國哲學季刊》的編輯和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的創辦者，他的學術組織活動體現了一位學者的公共生活。其它生活如何呢？大約二十五年前，我和他一起在法國南部的南方學院參加研討會。那天下午沒有會議安排，我沿著一條通往西班牙的山路走了幾英里，走著走著發現山路被雨水沖壞了，便折回賓館趕緊沖了個熱水澡。之後，成中英穿著臥室的拖鞋沿著同一條山路出發，堅持走過了被沖毀的地段，一直走到了西班牙。那天，他很晚才回來，全身上下都被雨水淋濕了，拖著泡濕了的鞋子。我問他去哪裏了，當他告訴我後，我意識到自己想成為儒者還需要更加努力。

成中英長我四歲。1982年，第三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兩年召開一次）在多倫多召開。會議期間的一天早晨，他殷切地邀請我和我的妻子到一個雅致的餐廳用餐。進餐時，他談論起有關中國哲學的研究，我從中感受到他對中國哲學的激情。他邀請我加入一個對儒家感興趣的研究組織，希望我成為這個組織的核心成員，並說有一天我會成為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的會長。此前我曾接觸過中國哲學，他建議我把這個領域作為研究重點（1992年我當選國際中國哲學學會會長）。他希望我成為一個深受中國傳統影響的當代哲學家，現在他的願望實現了。他個人對我的期許，不是成為一個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而是成為一個能踐行這種哲學的哲學家。

儒家傳統強調家人之間的真誠相待，成中英的家庭關係藉《中國哲學季刊》的共同事業而變得更緊密了。就我的瞭解，他的夫人顧林玉是完全意義上的伴侶，她承擔著《中國哲學季刊》執行編輯的繁重工作，在緊張的工作中還經常給諸多作者及成教授的朋友寫信。成教授經常外出旅行，有時她陪同出行，更多時候則留下來處理期刊的工作。她也是一位真誠的人。

成中英已經八十五歲了，但精力依然很充沛。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的行政人員已經換了幾代，作為創始會長，他有時會抱怨學會有些事不再徵求

他的意見，也不喜歡有人勸他退休。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他對中國哲學始終保持著最初的熱情，這種熱情為他贏得了友誼，並使他成為國際中國哲學學會裏不可替代的角色。我們高興地看到，他源源不斷的學術著述使他享有很高聲譽，同時我們也將銘記他對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的不懈貢獻。

古時候，年輕的儒者在自己的家鄉長大。在家鄉的學校裏，他從小就開始背誦經典，雖然還不理解其中的奧義。當他逐漸長大，進入青春期，開始在身體力行中理解經典的含義。成年後，他將學會如何控制自己，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更為成熟以後，他可以「從心所欲不逾矩」，過著自在的生活。成中英幾乎沒有這種傳統儒者的成長經歷。他在台灣國立大學獲得本科學位後，系統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因此，通過回歸自己的文化根源並在其中孕育成長，他才成為了一個儒者。漢語雖然是他的母語，但他卻不得不在母語文化之外的生活環境中研究中國哲學，仿佛如很多西方學者一樣，在人生的成熟期才邂逅了中國哲學。他必須努力將對中國經典的詮釋與自己的原創哲學結合起來。最重要的是，成中英不得不以自己的哲學語言創建他的哲學體系，在他之前，很少有儒者這樣嘗試過。我認為這恰恰是當代中國哲學家必須完成的使命。從這個意義上說，成中英的生活是典型的儒者生活。我為有他這樣的親切的朋友而感到無比驕傲。

[1] 此段譯文採用了吳怡的翻譯，見方東美：《生生之德》（中華書局，2013年），第232頁。

Chung-ying Cheng as a Constructive Modern Confucian

Robert Cummings Neville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Theology)

Translation: Li Zhensheng (Glasgow Colleg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Proofreading: Li Y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ung-ying Cheng has developed his own philosophy on his own terms. It is what a Chinese philosopher today must do. Cheng has lived his life as a model Confucian in this sense. In this essay, I shall explore five areas of his work that constitute the achievements of his life as a modern Confucian. The first of these is his appropriation of his Confucian and more generally Chinese past. The second is his contributions as a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in the Confucian mode. The third is his applications of his philosophy to a series of very practical problems. The fourth is his work as a scholar-official to found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 The fifth is his personal life as a Confucian.

Key words: Chung-ying Cheng, modern Confucian, Chinese philosophy